



序

2011年年末,海南省社科联与三亚学院联手建立海南岛屿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作为首席专家,我在基地的揭牌仪式上表示,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岛内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做一次地毯式的普查。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可以说是基地研究的初步成果。

论文集的出版以及“乡土三亚”的书名都是由陆丹博士先提出来的。说实话,最初我对他的建议颇为犹豫。原因之一是目前调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只能算作“浅尝”,距离预定的目标还很遥远。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费孝通先生曾以“乡土中国”为名,写了一本几十年来始终畅销的书。“乡土三亚”虽然将地理范围缩小了,但不免有东施效颦之嫌。而且,凡知道我是费先生学生的人,更会有这样的联想。

尽管有上述顾虑,我还是采纳了陆博士的提议。原因也有两个:其一,忆及当年费先生对我做学问的指导中,有三点是他特别强调的:富民、求真和快捷。费先生曾说过,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是做学问的目标,而求真务实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前提,这两条一定要坚持。同时,由于现代化变迁加速,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快出成果,不够精细可以再加工,但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其二,我非常赞同陆博士在校内倡导的实证研究取向。三亚学院是一所民办高校,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很猛。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拥有了2万名本科生和一座美丽的校园。作为学校的主政者,陆博士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的教学必须以科研为基础,无论公办抑或民办,衡量一个高校最主要标准是其学术水平。故他不仅在办学初期就注重科研,而且要求师生走向田野,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撷取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基地的建立与陆博士的这一倡导密不可分。

本书选取的论文大多体现从实求知的取向,作者们深入田野,努力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现实。尽管有些论文还显得粗疏稚嫩,但它们所展示的无疑是三亚和海南居民社会生活的画卷,其中还透出一股浓重的乡土气息。

正是在这一点上，“乡土三亚”还是比较切题的。

从海南原住民黎族来看，他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因此，在他们眼中的海南历史，如同荷马史诗一般，是那些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在现有考古证据不足、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收集尚存于这个岛屿上的文化信息，进而以大量地方性知识的综合去展示真实的历史。这或许既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且也符合变“宏大”为“碎片”的叙事趋势。

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包罗万象，故论文的涉及面很广。然而，一本论文集总得讲一点条理和结构，所以我勉为其难地将40余篇论文分为“人文历史”“社会发展”和“旅游经济”三大块。但对于基地的研究而言，并没有学科之分，只有视角不同。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有些论文因作者的需要曾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但这次入选后都做了或大或小的修改。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纷繁的日常生活描述中发现海南社会和文化的两个显著特点，即原生性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与具有共生意识的“合亩”文化。

所谓原生性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简单地说是指这里的岛屿社会并没有形成完全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城乡分割和对立由来已久，并且曾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个问题在海南和三亚并不严重。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分设，虽对城乡居民产生一定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把社会身份附着在户籍上。对三亚几个村子的调查资料显示，人们甚至不考虑城乡之间的职业差异，而只是居住地的不同而已。这种原生性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将对未来社会公共产品的普惠、合理分配产生重要作用。

而“合亩”文化起源于海南黎族地区一项传统的社会制度。经过研究，我们获得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合亩”制度是黎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合亩”二字也很有意思，“合”是统合的合，“亩”是一亩田的亩。这两个字的结合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人们在土地劳作上的合作。然而，那是根据黎族语言的发音所书写的汉字，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黎语中的“合亩”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在调查中，黎族朋友告诉我们：“合”与汉字合的意思大体相仿，即大家集合在一起；而“亩”指的却不是土地，更不是土地的单位，而是指人们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只要是长相厮守又相互依赖，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则可称为“亩”。据此，“合亩”就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社会。而在此之前的很多研究报告和论文都把“合亩”解释为黎族的

一种生产组织、经济制度或一种分工体系。应当说,这些解释并没有错,符合黎民居住区域长期的生产实践。

可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合亩”这种生产关系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吗?迄今为止,“合亩”这一分工体系失去它的生产职能已有60年之久。但在观察中,仍然可见“合亩”遗留下来的社会生活形态及其种种观念。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合亩”的范畴可能超越生产领域,即黎族文化里的“合亩”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生活形态,而且黎族的这种社会形态对全人类的社会制度变革有一种特别的启示。

众所周知,人类生活的社会制度,择其要者,大概有六七项之多,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娱乐制度等。这些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之间的耦合性问题,即:某些制度的改革走在前,某些制度的改革落在后。这种制度差距会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强烈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例如,大约在300年前,人类的经济制度因工业化而进入了一个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确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在当时政治制度尚未改革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导致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除了引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之外,还会让人失去主动性,变成机器的附庸和延伸,这就是所谓的人的异化。于是,人们不得不改革其他社会制度去部分弥补经济制度的不足,例如用现代政治制度进行全社会范围的两次分配,避免贫富落差过大。

可是现代政治制度又有其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组织体系是宝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故而很容易产生官员的眼睛向上、对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对此,我们现在不仅在法律层面、制度层面进行改革,而且还提出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即走群众路线,关注民生。由此可见,社会发展与进步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克服和消除各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达到制度之间的耦合与互补。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南黎族的“合亩”文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尽管“合亩”起源于经济,起源于种“山兰稻”的合作生产。但是,这种生产制度并不独立特行,它是与其他的社会制度,例如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补充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甚至它还进入了比社会制度更加深入的精神层面,如“合亩”精神在黎锦的编织、妇女的文身中都有一定的表达。总之,各种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制

度都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合亩”原则之下进行互补。因此，“合亩”文化对当前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还应当看到黎族民众在“合亩”体系里，尽管有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远近之分，尽管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体现自身的魅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同一个“合亩”体系里，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平等的。即便是“黎头”（“合亩”单位的首领）也只有普通的一票，与该体系内的其他成员没有太大的区别，由此体现出“合亩”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应当说，这种基于自愿的平等参与以及和而不同的充分交流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本论文集里的发现还只是未来的起步。关于岛屿社会与文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我衷心希望年青一代能够迅速成长，在不久的将来写出更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最后，对各位作者的慷慨赐稿，对丁晓军与张永庆所做的论文收集和联络工作，特别是对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军编辑为文集出版付出的辛劳，一并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是为序。

沈关宝

2014年仲秋于三亚



目 录

- 海南移民古今 / 冯汝常 © 1
- 海南历史三则：“落笔洞人”、华侨与“海盗” / 王致兵 © 13
- 开琼两“伏波” / 刘 霞 黄守红 © 22
- 成于传统而归于传统
——以苏轼、海南籍进士和举人为例 / 张 刚 © 34
- “锦伞平积乱”——冼夫人对海南开发的贡献 / 刘 霞 © 42
- 论海南文化的形成、融合与发展 / 黄守红 © 51
- 海南文化的他者想象 / 谌 林 © 63
- 从文化的边界地看海南岛海洋文化的双重性 / 唐蔚明 © 72
- 海南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策略研究 / 王宏海 © 79
- 海南构建影视基地的空间结构研究 / 王 圣 © 83
- 海南民间故事与传说的象征意蕴 / 马书红 © 90
- 道教思想与海南休闲体育文化 / 芦 燕 © 96
- 海南黎族起源的再认识 / 杨 丹 © 102
- 黎锦工艺说 / 姚丹丹 © 108
- 黎锦与“终极”救赎 / 冯建章 © 113
- “公期”：海南民俗盛宴 / 林 颖 © 118
- 毛感高地黎民的情感 / 李 利 © 125
- 论三亚社会发展的“绿色崛起” / 陆 丹 © 158
- 三亚城市社区建设研究 / 沈关宝 李 曼 陈飞强 © 165
- 田独三村 / 陆 丹 李 利 © 210
- 蛋家家屋 / 马智蝶等 © 226
- 蛋家人的日常生活 / 林雪恋等 © 235
- 三亚河口临高籍渔民的亲属关系 / 余玲娟等 © 246
- 崖城中心渔港 / 李 利 蒋传刚 © 253

- 黎族居民的收入与消费透视 / 王 微 © 264
- “合亩”传统与地方社会再生产 / 杨 丽 © 273
- 人力资本积累对海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高一兰 © 316
- 六道、安罗社会调研报告 / 李 利 刘 凌 © 324
- 海南“候鸟”老人的机构养老模式探讨 / 杨 扬 © 343
- 论“海南岛和平建设运动”的实质 / 许寿童 © 352
- 海南省城镇体系等级层次结构研究 / 王胜男 马 昭 © 358
- 海南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其选择 / 陈祥敏 宗和静 © 369
- 论海南生态文明与绿色崛起 / 王毅武 © 376
- 资源市场配置与海南产业结构趋异效应 / 帅先富 李文君 © 384
- 基于 SD 理论的海南旅游系统规划 / 韦鹏飞 © 395
- 海南人文资源的增值途径 / 朱沁夫 隆云滔 © 404
- 海南人文旅游资源利用状况分析 / 杨 樾 © 414
- 海南人文旅游资源的评价与开发 / 雷 春 © 424
- 黎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 庄 岩 张洪双 元 元 © 433
- 沙雕艺术与旅游发展 / 鲍富元 © 438
- 三亚海上运动俱乐部研究 / 马应才 © 445
- 海南旅游业法规体系的构建 / 李如跃 赵娜娜 © 449
- 珊瑚礁保护的立法思考 / 王 婧 © 456
- 论无居民海岛的开发与保护 / 宋杉杉 © 462



海南移民古今

冯汝常

德国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①认为地球上的大陆本来是被海洋包围着的、连在一起的一整块陆地，由于内外力作用逐渐形成了今天分布于各地的七大洲，而海洋也被陆地分割为互通的八大洋。陆地漂移了，随着陆地漂移的还有陆地上的生物，后来，不同陆地的这些生物发展成不同类别的原始人群。然而，海南岛并不是大陆漂移形成的，它一座大陆岛。据说海南岛上最早出现的“三亚人”，其后裔主要是黎族（本地黎）。可是，研究者认为，即使是黎族，也是从大陆移民来的。^② 自从汉代以来，海南岛陆续出现了黎、苗、回、汉等不同民族的移民。那么，这些不同民族的人口是在什么背景下移民的？在海上交通还不发达的时期，又是怎么来到海南岛的呢？这就需要了解海南移民史。

一、最初的移民——穿越山海丛林的艰难时代

《琼州府志》言“琼州地居海中，广九百七十里，袤九百七十五里”，“外匝大海”^③。那么，这个被大海与大陆隔开的岛屿，其居民是什么时期出现的？据考古研究，大约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在三亚落笔洞出现了“三亚人”，他们据说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但是，这个研究缺乏进一步的资料佐证。在文献记载中，秦朝设置的南海、桂林、象郡等南方三郡，海南属“象郡外教”。

① 参见魏格纳：《海陆的起源》，李旭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参见练铭志：《关于海南黎族族源的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③ [清]萧应植、陈景埏纂修：《乾隆琼州府志》，《续修四库全书·地理类·疆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西汉时期,海南岛的居民已受官方管辖,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国征服了海南岛,次年便在岛上设立珠崖、儋耳二郡。郡县设立后,移民渐多。当武帝、昭帝之时,儋耳、珠崖两郡有两万三千多户居民。那么,这些居民是“三亚人”的后裔吗?“三亚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汉书·贾捐之传》中说海南岛的居民为“骆越之人”,是“南方万里之蛮”,其习“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其民譬犹鱼鳖”,言语中多有中原人物的傲慢不齿。贾捐之所言的“骆越之人”,据考古学者研究当属于古百越人的一支,而黎族在习俗等方面与活动在广东西部、西南的百越人后裔“俚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黎族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黎族在汉、唐时称“里”或“俚”。这些黎族人,大约于殷商时代的早期横渡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泛海而来的黎族先人成为海南岛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在岛上洞穴群居生活,用简陋的打制石器从事简单的劳作,在这个荒岛上留下了人类早期活动的遗迹。

据研究考证,史前时期,海南岛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黎族、壮族等民族,大约有一万人。研究者从他们的生活习俗、使用的渡海工具、居住的船形屋和遗留的方言情况考证,认为所谓的“本地黎”与大陆“越人”在各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此外,德国学者史图博(H. Stübel)在《海南岛民族志》^①一书中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传说故事等方面进行解读,发现海南黎族与印尼古代马来民族、印支次大陆等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认为黎族中的本地黎与杞黎、倅黎和美孚黎是两个系统,说本地黎是本岛土著居民,而后三支系是经过几次民族迁徙从南洋海外浮槎北渡进入海南岛。这与我们一般认为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是从大陆迁移至海南的观点不同,可以算作一种不同的阐释与补充。因为,海南岛与我国大陆的地缘、血缘、文缘等关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南洋各地所无法比拟的。或许,他忽略了南洋各地的民族,不少是从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下南洋的后裔这个事实。

也有学者从遗传学角度分析,认为黎族在遗传结构上体现出典型的百越特征,黎族中的加茂人在语言上和黎族其他支系很不一样,遗传结构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并认为海南的苗族,就是从广西来围军的蓝靛瑶,因为他们在语言、服饰、习俗、遗传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异。在黎族之后从两广来到

^① 参见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1937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据日文译本编印,1964年油印本。

海南的可能是临高人,他们进入海南岛北部使得黎族进一步南迁。临高人也是典型的百越民族,在语言和遗传结构上和壮族很接近。因此,遗传结构上,临高人—壮族—布依族可以连成一条演化线。这些都说明了海南黎族分支的不同来源特征。



图1 海南省民族分布示意图

(乾隆)琼州府志 卷五上

张	吴	郑	谭	张	朱	冷	黄	陈	董	李	刘	冯	郭	李	何	李
定安人任	正德年任	长汀人	全州人	瓊山人	瓊山人	大竹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瓊山人
丁士達	上杭人	吳壽	黃文舉	周振	吳濬	傅濬	王尙質	周榮	羅勝	郭則	郭則	郭則	郭則	郭則	郭則	郭則

图2 《琼州府志》资料图

但是,黎族的这些不同分支是不是“三亚人”的后裔呢?目前还无法确知。从时间上看,三亚落笔洞的“三亚人”距今约一万年。即使是“三亚人”,也并非海南岛最早的人类。近来,昌化江大广坝水域的南阳溪考古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队在地层中发现3件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1件和砍砸器2件。另外,在地表采集到夹砂红陶片2件。这些出土器件说明,此处的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果真如此,海南岛的人类活动历史将比落笔洞的“三亚人”又前推了一万年。因此,“三亚人”或许是南阳溪人的后裔或旁支。然而,这些本岛的早期人类及其后裔延存,现在还多在考古学层面上探讨。

在人类生产活动能力极其有限的古代,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移。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设郡,“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远离大陆的海岛,不安的社会环境,加之尚未开发的经济等,对于社会发展稳定的大陆中土人士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

二、移民的涌入——浮槎渡海而来避乱的大陆客

秦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岛属“象郡外教”。出于管理属地、开拓疆土与征讨南越叛乱需要,秦征发所谓“罪人”“赘婿”以及商人等约50万人设防于岭南,“使与百越杂处”,此为岭南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据《正德琼台志》^①卷三记载:“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玳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有至者矣。”因此,商贾或有渡海至海南岛者。

到了西汉末年,由于中土战乱动荡,使得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包括岭南地区都有人口迁入。此时,岭南一代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这跟移民的到来不无关系。

西汉武帝时期,南粤数叛。汉武帝元鼎五年秋,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至南粤平乱。元鼎六年冬,“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九郡”(《汉书》卷九十五),其中“儋耳、珠崖”在海南岛。据《琼台外纪》“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可见已经有不少

^①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

移民了。到了汉末时期，中土动荡，为避战祸远奔岭南者增多，避居偏僻的海南岛者日众。其他，如王莽时期，中原的“罪人”就有被迁徙至岭南的，其中也有一部分到了海南岛；如“（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青州人王氏与二子祈、律，家临高之南村，则东汉有父子至者矣”。至三国时期有数万户到海南，东晋乱世时更多达有十万户避居海南岛。

其后，从南北朝至隋代一统南北并在海南设郡立县，大陆移民陆续增加。移民有不同的民族，汉族之外，还有“俚人”。五胡乱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室被迫南渡，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中原向南方的人口迁徙。据研究资料，南朝刘宋境内人口约500余万，而北方南渡人口约90万，约占1/6。此时，位置偏远的海南受到其余波影响，有移民零散地南迁来岛内。至隋末唐初，海南移民出现了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入，即大陆俚人在首领冼夫人的带领下迁来海南。

南朝至隋初，部族首领冼夫人控制了南越大部。她“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峒，部落十万余家”，海南与雷州半岛有“千余侬俚人归附”。隋开皇十一年（591年），为加以利用其并控制岭南，隋文帝将临振县1500户赐作冼夫人的汤沐邑，赠其夫为崖州总督。当海南生乱，受隋皇恩的冼氏家族带兵南下，平定海南割据势力的叛乱。由此，大批俚人兵马及冯冼家族的仆从进入本岛，使海南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如隋大业五年，仅珠崖郡就有19500户。

大量“俚人”入居海南之后，他们聚居的地域开始分散。除海南岛的西北临高外，他们还分布于南部和东南部，即儋州、临高、澄迈、海口、定安、琼山、崖城等地，除岛东北的一个缺口外，呈现出环状地带分布。

唐代海南移民，以晚唐最盛，人数曾达7万。这些移民构成相对复杂多元。移民中有流寓海南的官员与驻防的军士及眷属，也有远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及手工业者，也有避乱此地的流民，此外还有因为海外贸易途径而留居或羁縻于此的波斯商人。如福建莆田人吴贤秀，曾官至户部尚书，因闽中动乱而携子于唐贞元年（805年）间迁琼，落籍琼山；原籍河南符元生任广东南雄太守，后选任中书令，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迁琼抚黎等。从史料记载，唐代有高官被贬此岛，如那个写下《登崖州城作》的李德裕即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何其感慨！这个远离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的偏僻海岛，竟然成了堂堂天朝宰相贬谪至死的最后归宿，他那个崖州司户参军的职位与其说是官职，倒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羞辱。还有韦执谊，他是顺宗李诵时的宰相（尚书左丞、同平

章事,相当于宰相),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即位后,他被贬官至崖州司户参军后,随带两位夫人和三个儿子及弟弟、侄子等人同赴贬所,也终卒于海岛。他们的后代大多落籍海南,其姓氏甚或成为从中原南流的始祖,或则融为黎人。明王元楨在其《漱石闲谈》中载:“李赞皇(即李德裕)之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遂为僚族,数百人,自相婚配。正德(1506—1521年)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僚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通。德裕敕诰尚存。”光绪《崖州志·杂志》^①引《旧志》云:“李德裕贬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招出验之,再三叹息。”皆可为证。

宦绩志二 谪宦 流寓

谪 宦

唐

刘纳言《制唐书》亦注,精《汉书》学,为当时宗匠。乾封中,以《汉书》授侍王曾。及曾为皇太子,累迁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常撰《唐书》十五卷以进太子。及东宫废,高宗见而怒之,留除名。后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唐志》

李灵耀,高祖第十九子也。垂拱四年,与兄元嘉、于黄、金瓿偕谋,欲起兵应接越王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缢而死。《唐志》

李昭德,长安人。睿明经,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贬振州崖水尉。还为夏官侍郎。《唐志》

韦执谊,京兆人。幼有才。进士及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顺宗朝,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永贞元年,宪宗受内禅。坐王叔文党,贬崖州司户参军,尝撰《事》。《唐史》云:崖州崖水尉韦执谊,新授亦有异文。始至今时只以吏部补授。回宰相谪外,解留心政。遂流寓民家。始未显时,不喜人言岭崖州县。既为郎,尝出取方,寓居至岭南,初寓日。命左右撤去。及为相,厨坐堂有图,不脱者。既易,乃试观之,崖州图也。以为不

黎人总说

取州黎岐,种类不一,迁徙靡常。文昌居黎之东北隅,在琼山安定之外,原无黎岐,会同、澄迈熟黎尽成编户,不异齐民,其余各州县之黎,约有九种:曰黎岐、曰俾黎、曰黎黎此熟黎也。曰下脚黎、曰大厂黎、曰小厂黎、曰雷黎,此生黎也,习俗大势相同,服饰居处各异,曰生黎,则处深山之内,逼近五指,无衣服屋宇,近于禽兽,其俗不可考。盖黎民居者为熟黎,言语多似广西梧州等处乡音,服王化知法度者也。其内为生黎,勇鸷犷悍;不当此,不纳粮,亦罕出外,其言语不可晓,必藉熟黎为译。然水土最恶,人亦不能至其地。又其内为生岐,相传黎母山有女自卵中诞生,适外来番禺与之偶,为生黎生岐之所自出。熟黎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多王符二姓,先世从征到此,利其土、乐其俗,窜入其中,彝其险阻,创为村峒。先入者为峒首,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有闻广亡命杂居其中,习与性成,子孙亦为黎矣,此其大略也。

图3 《崖州志·宦绩志二》“谪宦”所载韦执谊

图4 《海南岛民族志》“黎人总说”截图

《儋县志》言:“五季之末,神州陆沉。大夫君子,避乱相寻。”经历五代,到了宋朝时海南的移民已达10万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儋县志》)史载,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① [清]张嵩,《崖州志》,邢定纶、赵以谦撰修,郭沫若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

158)。南宋南渡,使得南方人口普遍增加,集中于相对稳定的江南一代,这客观上为海南移民提供了可能。

从来源上分,宋至元时期的移民中大多属于避乱的士庶、驻守的官吏与军士之后、游走的商贾、沿海的渔民以及其他流落此地者。如福建莆田人符有辰,于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至琼任清化军指挥使,因功封万户侯,卒于任所,后人落籍文昌;福建莆田人许谟,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任琼州通判。他死后,其后人流寓文昌、琼山、临高一代。另外,因为战乱,占城的回教徒也多有来海南移民的,多聚居在崖城一代。据宋王存编《元丰九域志》载“元丰三年(1080年),海南岛有10 266户”,《宋史·地理志》载为10 317户,人口尚不如隋唐。

宋代移民中,文学家苏轼与名臣李纲、赵鼎、胡铨等人的到来,为海南岛增色不少。

特别是苏轼,他每到一地,往往“考其政,察其俗”(苏轼《两汉之政治》),并且写下大量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涉及当时儋州的民俗文化。据统计,苏轼贬儋三年,写诗127首、札记76篇、信札38篇、论16篇、赋5篇、铭4篇、词4首、表2篇、颂1篇,这些构成了他自评的“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三“功业”之一。符永光在《海南文化发展概观》^①“历代民族移民”一节中对宋代海南移民进行了分析,认为“五代十国至宋代是我国北方向南方大举移民的第二次高峰,其时移民的方向多从中原往东南沿海诸省大流动,尤其是福建省,以至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局面。于是,宋代闽人(包括落籍闽南的中原人)开始迁移广东、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国。大批的有意识或松散式的移民,沿着粤东的潮汕平原南下,他们跨越珠江三角洲,经粤西、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这是沿着陆路来的移民。而自闽南沿海从水路乘船直达海南岛者,大多在岛北至岛东部的琼山、文昌至琼海一线登陆,形成了宋代闽南人向海南岛移民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海南方言以闽南方言为母语基础的开始”。从中可以看出,闽南人成为本阶段海南移民主力。此外,还有漂浮于海上的疍民,他们来源自百越遗民,多于北宋时到海南,也有人认为他们属于闽人。

闽南人成为此际移民主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闽地文教的发展,涌现了不少莆籍官员赴外任职,他们继而在当地入籍,带动了闽人移民。南宋时莆田玉湖村陈氏以“一门二丞相,九

^① 符永光:《海南文化发展概观》,香港新闻出版社,2001年。

代八太师”闻名。其他如在广东海南地区任职者，有高宗建炎间任广东运使的郑徽，潮州通判黄詹；有元朝雷州知府黄行可、林民止，推官李文献，通判陈宗虞、方山，同知朱子宣；宋高宗时入琼任琼州安抚史的林暹，南宋昌化知县郑志灏，宋端宗年间雷州太守何仁德，温姓入琼始祖、宋代海口参将温自生，黎姓入琼始祖、琼州府琼管副使黎中乐等。二是避难外迁与经商之士民。莆田地区先民，有为躲避战乱而逃难入琼者，如丘姓始祖丘文材于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随张世杰部攻雷城，兵败而渡琼，落籍于澄迈县。

自隋代在海南设郡到宋末，海南人口增减反复。如唐代贞观十三年（639年），海南有12万多户，但是，到了宋代元丰三年（1080年）却减少至11万多户。个中原因，除了天灾人祸，还有中原相对稳定而海南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它已经对移民没有吸引力了。

自元至明，海南移民人口开始增加。据《琼州府志》载，到元天历二年（1329年），此时户数达9.2万，人口16万余（此数据不大合理，平均一家还不到2人——笔者注）。元代的民族压迫与野蛮统治，加之元末明初的战乱，导致避难海南的人口剧增。据明初人口统计，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海南人口有29万余，比元代净增13万，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原因除了元末的战乱，与移民的方式与构成变化有很大关系。

第一，移民来源的变化。首先是派来住岛的军队，他们作战并屯田于此，任务主要是平黎乱。如元代在海南就设有屯田万户府，据《元史》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海南屯兵落籍的就有1.3万人，屯户0.65万人。明代屯田，在海南岛设置一卫十一所，常备驻军约1.6万人。另外，为平定叛乱，明嘉靖、万历时征调苗人进入海南，其子孙多居留岛上。其次是宋末南迁的福建莆田人，他们为避祸多迁至雷州半岛与海南，其中以陈姓人为多。据《各姓氏入琼始源》先后来自莆田的姓氏就达41个。再次是商贸留居海南者，据《广东新语·货语》中载有“琼货”，说明客商较多。

第二，人口的东移和民族集中分布区域的发展。海南移民中，多选择西部的临高、儋州等地，但是，到了元明时期东部人口开始增加。如福建莆田人汤肇基，于元末从莆田渡琼从商，就居于海南岛东部的文昌。

第三，移入与移出呈双向性。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黄道婆。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初黄道婆曾经向黎人学习纺织技术：“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计就殷。未几，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

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大批手工业者失业,或被掠夺,或被欺骗,海南不少移民到海外去做华工。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载:从1876年至1899年的20多年间,远赴海外的海南居民就达24.17万人。自1902年至1911年,海南迁往新加坡和暹罗两地的移民,平均每年就多达2.7万人。到了民国时期,仍有大陆士民到海南避难。据陈植《海南新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海南岛居民为219.5645万人。

由此可见,自汉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海南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大陆,避乱、屯田、流贬、商贸等成为移民主因。

三、新时代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的美丽宝岛建设者

据族谱资料统计,旧时代海南移民姓氏有103个,其中,按朝代划分为唐7个、宋48个、元7个、明37个、清4个;移民始祖有162个,据其中132个来分析,分别是唐10个、宋62个、元8个、明48个、清4个;按地区分,始祖中来自福建的有104个(其中莆田82个),中原地区15个、广东10个、广西3个。可见,旧时代的移民还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新时期,海南移民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不仅不再因为战乱、贬谪、屯田等原因而被动迁移海南,而是为响应新时代的号召,为开发建设海南美丽宝岛自愿而来,他们是建设性的新移民。

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自雷州半岛横渡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出于建设海南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留下部分军人转业,参加海南建设。由此,翻开了海南岛移民的新篇章。

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的“橡胶热”。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为控制东盟,不断制造麻烦,南亚的橡胶已经很难供应中国。为了获得橡胶、矿石等战略物资,中央政府陆续投资到海南,通过创办农垦种植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以满足战略物资和经济发展需求。海南的土地得到大力开垦,用以生产国内所需的各种物资,随之,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大军来到海南,掀起了开发海南的热潮。转业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等成为这次移民热潮的主力军,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是首批支援海南边疆建设的有志青年。他们有知识、有技术、有干劲,积极加入农场劳动大军中,投身于橡胶的种植与生产。在此带动下,海南以橡胶种植为中心的林业得到发展,自1953年至1957年增长率竟高达21.6%,而以铁矿为中心

的工业增长率也达到了26%。这些成绩,离不开从1950年至1965年的30万海南岛移民大军。

其次,20世纪60年代的“垦荒热”与70年代的“育种热”。海南的发展与建设移民都与国际和国内大的政治气候有关。国际上,美日继续反华,策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排华反华,不少华人受害而选择归国,有些华侨就被安置在海南;国内来说,一是“以粮为纲”带动下的粮食生产需要,那时的人们将草原、森林、高山等开垦为农田,二是当时出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海南成为输出与展示共产主义的一个前哨。为建设新海南,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农垦事业继续快速发展,兵团方式在组织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军队、知识分子与支边青年的到来,按军队方式管理,使得开荒造田与保卫边疆互为一体。但是,由于过度垦荒忽略了环境保护,海南的森林面积快速下降,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代价。

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给了它天然大温室的称号,由此被荣选为全国育种基地。在当时“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等指示的号召下,大批内地农民代表被选派来到岛上学习育种。然而,热潮过后是荒凉,当年大批满怀热情的青年新移民随着理想的疲惫和青春的流逝,逐渐加入返乡大潮。与大陆相比,海南似乎已经褪去繁华,“穷”(琼)岛海南逐渐成为发展缓慢、闭塞落后的代名词。

再次,20世纪80年代“建省热”与21世纪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随即《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1988)26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出台,这个俗称“三十条”的文件,为海南岛的快速开发打开了大门。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此前,《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曲已经唱遍全国,而1988年后的特区建设热潮更使海南岛再次焕发青春活力,不少大陆与海外投资客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十万人才过海峡”,6000家公司仿佛瞬间在海南成立,海南岛再次受到移民的青睐。到2000年,海南全省总人口为786.75万人,比1990年增加了130.9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67万人。^①

^① 岳嵬:《回顾海南建省25周年特别历程:1988海南新纪元》,《海南日报》,2013年4月10日。